

# 臺灣學知識與方法的應用——清、日交替下的東臺灣為例

講座日期：105年1月9日

主講人：潘繼道（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）



▲大庄平埔夜祭。

清光緒20年（1894），清、日爆發甲午戰爭，隔年（1895）清割讓臺灣。然日人接收並不順利，直到該年10月底才進入臺南城；明治29年（1896）5月25日才正式在卑南登陸，進入東臺灣（後山）。正當清、日政權交替之際，後山中路的平埔番（西拉雅族）於明治29年的農曆正月初5後，遭清帝國殘兵攻擊。

東臺灣發展向來迥異於西部，其具有邊陲性、延遲性、海洋性、多元性、特殊性及移民性，且國家力量介入後具有很強的計畫性與支配性。對於東臺灣歷史，如能放在東臺灣特殊的時空背景來了解與還原，相信能補足以西部臺灣為主軸研究的「臺灣開發史」之缺憾。

平埔番乃清道光年間之後，由南臺灣陸續移入。光緒10-11年清法戰爭後，凸顯臺灣在海防上的重要性。光緒11年10月，清廷調任福建巡撫劉銘傳為臺灣巡撫，次年4月就任。劉

銘傳為使臺灣建省後有可靠財源，在光緒12年上〈量田清賦申明賞罰摺〉，設清賦總局於臺北、臺南兩府。但在後山中路因執行過程缺乏嫻熟丈量的佐雜文官，丈量時下層武員也過於粗暴，於光緒14年6月引爆平埔番抗官的「大莊（庄）事件」。

後山有清軍（勇營）進駐，始於清同治13年（1874）「牡丹社事件」後的善後措施。期間勇營經添設、裁撤、移駐、合併等，至日軍接收前由鎮海後軍中營、前營、左營及三屯駐守，兵力約兩千人。統領中營的是副將袁錫中駐防於南鄉的卑南（臺東市）；統領前營的是副將劉德杓駐紮於新鄉的新開園（池上鄉錦園村）；邱光斗則統領左營，駐守蓮鄉的花蓮港（吉安鄉海邊）。這些清軍在甲午戰爭後清帝國經濟窘迫的情況下，得不到糧餉，不斷向後山民番強行徵收，引發民怨。

關於清軍征伐，在教會報、日治時期檔案、文獻、專書中有不同記載。《臺南府城教會報》134卷（1896年5月）、137卷



▲田代文庫記錄鐘文振訪談。

▲《臺南府城教會報》137卷刊後山消息。

（8月）、138卷（9月）刊載因後山清軍對基督徒誤解，認為前山的牧師將臺南府城獻給日軍，後山教會的人也必定會如此。

明治29年正月初3（陰曆），有人假冒石碑教會傳道師鐘文振（Cheng Bùn-chín）的名字，寫戰書寄給新開園營的統領劉德杓。新開園的陳協台跟寶桑的張阿鷺寫信到新城，鼓舞李阿隆、邱光斗、陳糊等人率兵南下，意圖夾擊花東縱谷的平埔番信徒。正月初5（陰曆），劉德杓率兵從新開園北上；北邊花蓮港的軍隊由邱光斗率領南下。12日（陰曆），觀音山禮拜堂（加蜜山教會的前身）遭清軍燒燬。20日（陰曆），石碑的禮拜堂（富里教會的前身）也被焚燬。當時從新開園到觀音山有十多個庄，只有公埔（富里鄉富里村）、大莊（富里鄉東里村）沒被燒。

同一年（1896），為調查東臺灣是否適合進行日本內地人移民，總督府技師田代安定前來東部，其調查後所寫的《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》曾詢問傳道師鍾文振，他答覆：「觀音山及石碑教堂自正月廿日被劉幫統及邱光斗（共賊將名）、賊兵燒去，以及平埔庄社多被害。」關於傳道師的姓氏「鍾」（Chiong），如參照前述教會報的白話字，有可能是姓「鐘」（Cheng）。另外，在他正式撰寫報告書前所寫的筆記或整理稿，即現收藏於臺大圖書館的「田代文庫」，記錄了鐘文振提到條約簽訂後清軍因糧食沒著落，又未回中國，因而出來搶奪民家物業。

《總督府公文類纂》及《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歷史草案》也曾記錄平埔番遭征



▲加蜜山教會前身即是觀音山教會。



▲富里教會前身即是石碑教會。

伐後的慘狀及憤怒。時任恆春支廳長的相良長綱於明治29年所寫的《臺東地方出差復命書》，提到向臺東歸順而來的番人查問狀況，得知公埔、大莊花錢消災，而沒被夷為平地。

從《大庄「沿革史」》中可判斷清軍應是長時期欺壓平埔番，以「大庄事件」作為名目經常索詐，造成議論。筒井太郎的《東部臺灣案內》提及日本統治後，從清國方面的交通斷絕了，屯駐兵無法取得薪俸及其他供應而變成土賊。

關於這次衝突，伊能嘉矩的《臺灣蕃政志》與白川夜舟的〈臺東舊紀〉都曾提及。伊能提到：「光緒21年正月3日觀音山庄的平埔番反叛，殺死大庄總理宋梅芳及下羅灣社通事朱某」。如參照教會報、《大庄「沿革史」》中都提到1月3日，〈臺東舊紀〉「光緒22年（明治29年）1月3日」的記載，大致可推斷應是伊能筆誤或抄錯了，以致相差一年。

要將清、日政權交替之際清軍征伐後山中路平埔番的起因、經過及結果完全還原呈現，有其困難度，但若將教會報、日治時期官方與私人的記錄加以對話，可拼湊出大致的圖象。